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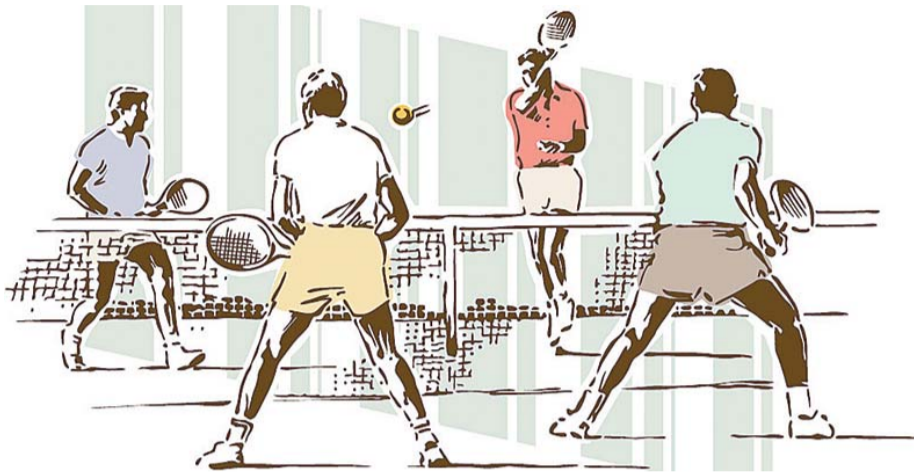
台湾学生的课外活动

□雨茂

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以来,两岸不仅经济交流频繁,文化教育交流的热度也很高。据我了解,大陆很多高校都与台湾的高校结对子,不仅互派学者访问研修,学生到对方的高校学习,学生之间的短期交流也很普遍。来台湾后,我去过两所大学演讲,与来台的交换生有过沟通,并向台湾的老师了解大陆交换学生的学习情况。获得的情况喜忧参半,台湾同行认为大陆来的同学学习非常刻苦,严格遵守作息时间表,从不迟到早退,但不大主动与老师沟通,参与社团活动不太积极。大陆学生认为,在台湾高校学习相对辛苦,要做大量的作业、报告,与台湾学生仅仅存在学习和生活上的交流,思想认识上有隔阂,无法深入交谈,很难融入台湾社会。

三年前我一个学生参加了中国大陆、台湾与韩国大学生交流活动,地点在韩国。她对我讲,大陆学生出国后普遍腼腆害羞,不敢出面组织活动,不知道与台湾地区及韩国学生谈什么,在主办方举办的联欢会上,很少有学生能够大大方方地表演节目,相反,台湾地区与韩国的大学生却很活跃,无论是学术交流还是文艺联欢,他们都是主角,表现积极主动。学生告诉我,每到这时候,她就尴尬不已,感觉很无助、很自卑。据我所知,外出交流的学生经过所在学校层层选拔,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如果连他们都如此表现,确实应该认真反思内地大学生人才培养的模式了。

去年7月初,我来台湾大学研修,住在温州街,这里是著名的文教区,人文气息浓厚,比邻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科技大学、台北教育大学等高校。晚饭后,我经



常去最近的台师大与台大校园散步,几乎每晚都能看到两校的学生在组织各种文艺、体育及论坛活动,报告厅、礼堂、游泳馆、运动场灯火辉煌,人头攒动。主办者都是各种学生社团、协会,鲜见以官方名义出面组织的活动。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学生团体还会在校内外散发传单,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甚至搞文艺演出,以宣传各自的理念,积聚人气。

不仅大学如此,中学也很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一天晚上7点左右,我与朋友途经一座广场,看到数百名中学生正在搞类似于大陆所讲的素质拓展活动,队伍在行进中不断变换队形,看似混乱,实际上却井然有序,一边还高呼口号,可惜我们听不大懂。我询问了一名在旁边休息的女生,她是女子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她告诉我,她们每周都要搞类似的集体活动(次数并不固定)。我很好奇,高中二年级课业负担很重了,此时应该是在家里写作业的时段,怎么有工夫搞这些户外活动呢?她说,她们每天7:30到校上

课,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午餐时段,就在学校附近用餐(学校没有食堂),下午4点放学,所以有时间写作业、搞活动。我比较了一下,我的孩子读初中三年级,每天7:15到校,中午有两个小时(夏秋季是两个半小时)的午休时间,晚上6:10放学,到家的时间接近7点,吃完饭就得写作业,根本没有时间参加户外活动。这必然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锻炼时间极度缺乏,身体严重透支;二是参与集体活动少,不能培养在今后的工作与生活中非常需要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对领导能力(这是西方学校教育中非常注重的能力,大陆教育界很少有人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的培养也极为不利。

文化知识的学习并不是全部,培养具有健全人格与和谐精神的人是教育的最终目的。蔡元培先生曾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爱因斯坦

也说:“我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针对学校教育,他还认为,“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如果学生经常能够组织参加各种集体活动,对塑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与健全人格定有帮助,对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能力,促进领导能力的提升也会大有裨益。

在大陆,常常有人呼吁要把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但实际上总是徒劳,应试教育的模式就在那里,谁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多,谁就是成功者,谁还在乎塑造全面发展的人才呢!如果从个人与国家长远发展的立场去考量,只注重文化知识学习的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涸泽而渔,也许只能培养听话的书呆子,对培养具备健全人格、能够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负责任的公民极为不利。

(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碎碎念

代宽几何

□王金龙

“妙妙是个葫芦娃,姥姥是个糊涂娃。”这是邻居家不到两岁的小妙妙对姥姥的评价——当她的姥姥出门忘了拿钥匙时。童真童趣,老少两代其乐融融。

代宽,是我一次在饭桌上与朋友闲聊自造的一个词儿,意思是代沟的宽度。现如今,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除了上述小妙妙这样年岁的稚童外,“代”级隔阂逐步演变成了“年”级隔阂,什么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一零后都不算什么事了。过去说20年一个代沟,前些年说10年一个代沟,有朋友说现在的代宽仅剩两三年了,基本上与iPhone手机的更新换代是一个频度。悲夫,幸乎?

其实,大人抱怨与下一代的隔阂越来越大,所谓代宽越来越窄,这主要是从对新技术与流行玩意儿的接受程度来比较的,成年人显得越来越落伍与OUT了。而从对传统的突破以及对自身生理、心理的认知乃至行为比较,当下则是小孩越来越向成人化靠拢,与大人的“隔阂”越来越小,表现得像没有代沟似的,就连幼儿园的小孩子们都觉得没有个男朋友或女朋友都很丢人呢。这其实就像照相机的快门与光圈的复杂配比变化一样,常人有时是越说越糊涂的。

徐克老怪年前把《智取威虎山》拍成了3D电影,带领梁家辉、张涵予、佟丽娅等在林海雪原里秀了一把炫技。影片中掺入了一个像《红高粱》中讲述“我爷爷”的“我”一样的角色,这个“我”是赴美留学的“红三代”,是电影里被座山雕嫁去当“压寨夫人”的民女青莲的外孙。比《红高粱》更进一步的是,徐老怪还让韩庚饰演的这个“我”在电影开头与结尾都亲自出场,并且跨越时空,让“我”与太姥姥、杨子荣、少剑波等坐在一起吃团圆饭。这些桥段设计,是很让我意外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徐老怪想告诉观众:代沟不是个好东西,传承是很重要的。

陈宝国、冯远征、牛莉领衔主演的电视剧《老农民》也在2014年年底开播。前几集中土得掉渣的中国农村场景,对现在的年轻观众来说已经越来越生疏了。这几年的抗日神剧,官斗剧等超现实的东西,虽然说的年代久远,但都是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甜腻腻的,让年轻人看起来反倒觉得与当下没有陌生感,无形之中却把真正触摸现实的作品给淹没甚至消解了。这,无形中加大了他们与父辈的代宽。从这里说开去,衡量代宽的标准,就不仅仅是网购与否,网游与否以及吃不吃肯德基麦当劳,唱不唱《小苹果》那么简单了。

梁实秋专门写过一篇长长的杂文《代沟》,他列举《尚书·无逸》中一段话,证明代沟古已有之:“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大意是说:请看一般小民,做父母的辛苦耕稼,年青一代不知生活艰难,只知享受放荡,再不就是张口顶撞父母说:“你们这些落伍的人,根本不懂事!”他还列举我的同乡张公艺,其九代同堂,“靠了一百多个忍字。其实九代之间就有八条沟,沟下有沟,一代历一代,那一百多个忍字还不是一面倒,多半由下面一代承当?”我想,今天拿出这段话来再读,仍然是并不都能获得认可的。倒是他最后的结论,中规中矩中听:沟是死的,人是活的,代沟需要沟通。

正在写此文时,手机上跳出一篇“微”文,大意是“我已经努力了”这种话只是losers的自我安慰罢了,是时候接受残酷的现实了:其实你的努力一文不值!

我在想,我若不能接受这样的话,就证明我的代宽又在加大了。

(本文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编辑)

名家言

□简默

他以强悍、粗犷、桀骜、敏感、特立、坚忍之态度和力量,从容面对跌宕潦倒的命运,像极了青藏高原上一头野牦牛。

看过青海湖,我是带着失望上路的。接下来在返回西宁途中,我们将去丹噶尔古城。

起初,我凭字面以为此“古城”是真正的古城,它矗立在没有人烟的荒原上,残垣断壁是岁月和往事的遗骸,无声地抗拒着风沙和雨雪,但同行的导游说,此“古城”是约十年前在老古城的基础上重建的。

失望似浓雾再次自我心头弥漫升起。也大约是从十年前开始,一些地方纷纷抢着拆了古建筑建仿古建筑,再挖空心思想地修新如旧,规模宏大地“造”出了一座座“古城”,却从里往外空洞得没有历史,文化和灵魂,只有盲目的双脚驮着简单的头脑,尾随在人流中疲惫地东奔西跑。

我在困乏和忐忑中担心着此“古城”也如是。

车到丹噶尔古城。我们被地接导游和她手中的三角旗牵引,沿着城中的街道边走边看,两边商铺林立,幌子招展,不知不觉地来到文庙。进入庙内,另有名堂,一个老者给每人发了本《论语》,说要领着大伙诵读。我转身出门,将诵读声撒在身后,端着相机信步闲逛,突然,我在左边回廊的墙上发现钉着一块木牌,上书“昌耀诗歌馆”,一个箭牌指示着方向。我穿过

诗人中的野牦牛

圆形拱门,走过逼仄的回廊,进入一个院落,正前方黑色基座上屹立着诗人昌耀的正面半身塑像,只见诗人面容年轻、儒雅、端庄,戴一副眼镜,胸佩一条白围巾,像许多“五四”青年那样缠绕过脖子垂到胸前,仿佛一条绶带,诗人的胸前另系着数条哈达。

我是真的想不到会在这儿邂逅诗人和他的诗歌馆。昌耀是我心目中的大师,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曾经为我高扬起了诗歌的图腾。二十多年前,我刚参加工作,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诗,初次读到昌耀的诗,他对我人生底蕴的深刻理解,他险峻峭拔古典如孤崖的语言,电闪雷鸣过我的心灵,叫我目瞪口呆。这时恰逢一个“饿死诗人”的诗歌困顿时代,即使“诗人中的诗人”昌耀也不例外。他生活窘迫、经济拮据,为此早已戒掉了曾如影随形的烟瘾,但他对诗歌依旧保有赤子般的纯粹与虔诚,就像藏区漫漫风雪朝圣路上一路磕长头的信徒,他一直恪守着将两首诗的灵感和素材压缩成一首来写的习惯,不肯挥霍自己的感情和才气赚取廉价的稿费。在1993年第十期《诗刊》上,昌耀撰写了短文《诗人们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他为自己出版自己的诗集《命运之书》,不得不采取此方式替自己预告和征订,因此该文也是一则征订启事。事后昌耀说:“这既可以说是一本诗人的自救,也是精神的自救——不媚俗,不告饶。”看过该文我当即响应,

汇款预订《命运之书》。近一年后的九月十九日,我收到诗人自青海省文联寄来的《命运之书》,一尊少女拉大提琴的花岗岩雕塑占据了火红封面的一半,仿佛契合着诗人字字啼血地抒写命运的不屈精神,诗人在扉页间写道:“王忠先生正,昌耀 签售, 94.9.11。”字迹工整,一笔一画,后头钤着他的名章。该书收录了昌耀从1955年至1993年近四十年创作的诗作,它们见证了诗人的步履蹒跚的困顿岁月,也见证了他执着追求精神高地的拳拳之心,更见证了一颗将诗与生命融为一体的伟大灵魂的命运交响。我一首一首地读着,这些诗用最小的字号印刷出来,它们互相牵手紧随,依偎取暖,一气呵成到底,不像当下许多诗集一两行诗句铺张地占了一整页,空白永远比内容和思想多。我仿佛读出了诗人无奈的背影,还有苍凉的况味,诗人也的确有过了自费出版时节省纸张而对诗作形式反复改动的经历。

写了四十年,这是诗人的第二本诗集,却以此方式艰难地仅印了2700册。此前某“诗人丛书”曾收入昌耀的诗集,到了出版社却被无情打回,理由是:“看不懂。”昌耀的诗歌幽闭着他命运的密码,有的人破译不

了,当然就读不懂了,这或许作为人生和情感结晶的诗歌的神秘所在,也是魅力所在。

来到丹噶尔古城我才知道,古城所在地湟源县是昌耀的第二故乡,这儿的日月乡是他最初的“边关流寓”之地,也是他成为一户藏族之家的义子和“赘婿”的再生之地。他曾写下了《慈航》、《哈拉库图》、《丹噶尔》等与这片土地命运维系的诗作,并最终成为“中国新诗运动中的大诗人”。

这位一生洞悉“信仰,是一种恒大的美”的诗人,自十四岁投笔从戎,十七岁在朝鲜战场负重负重伤离开火线,十岁被当成“右派”,四十三岁彻底摘除“右派”帽子,至新千年三月的一个早晨,罹患肺癌的他不忍疼痛,毅然从窗口奋力一跳,扑向冉冉升起的太阳……

他在诗中写道:“沿着河边/无声的栅栏——/九十九头牦牛以精确的等距/缓步横贯茸茸的山阜/如同一列游走的/墩堡。”(《慈航》)他以强悍、粗犷、桀骜、敏感、特立、坚忍之态度和力量,从容面对跌宕潦倒的命运,像极了青藏高原上一头野牦牛。

九十九头牦牛外,第一百头是野牦牛,他的名字叫昌耀。(本文作者为青年散文家)

